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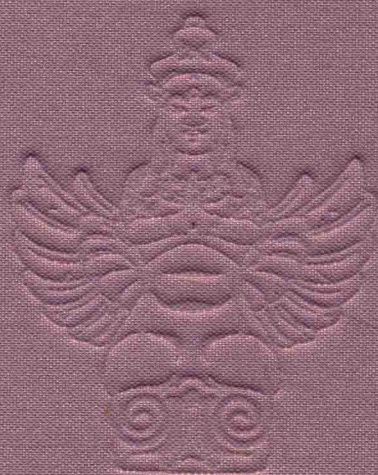
第一辑

杨富学 主编

丝绸之路历史与考古研究丛书

西夏考古论稿（二）

牛达生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

第一辑

杨富学 主编

西夏考古论稿 (二)

牛达生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夏考古论稿. 二 / 牛达生著.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6.12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 / 杨富学主编. 第一辑)

ISBN 978-7-5490-1266-4

I. ①西… II. ①牛… III. ①西夏—考古工作—文集 IV. ①K871.4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03306号

西夏考古论稿(二)

牛达生 | 著

项目策划 | 鄯军涛

责任编辑 | 鄯军涛 凯 旋

封面设计 | 马吉庆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 486 千

印 张 | 31

印 数 | 1-1000

版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1266-4

定 价 | 11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总 序

丝绸之路是一条贯通亚、欧、非三洲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自古以来，世界各地不同族群的人都会在不同环境、不同传统的背景下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成就，而人类的发明与创造往往会突破民族或国家的界限，能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丝绸之路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东西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和互补性。

在中西的交往经久历程中，中国的茶叶、瓷器及四大发明西传至欧洲，对当时的西方社会带来了影响，至今在西方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反观丝绸之路对中国的影响，传来的大多是香料、金银器等特殊商品，还有胡腾舞、胡旋舞等西方文化。尽管这些西方的舶来品在考古现场有发现，在壁画、诗词等艺术形式上西方的文化元素有展示，但始终没有触及中华文明的根基。

早在远古时期，虽然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之间并非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草创期的丝绸之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最初，首要的交易物资并不是丝绸。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原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

行小规模贸易交流。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于是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的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传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才开始饲养马。双峰骆驼则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可以在沿线各强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激发敌意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

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强盛，他们同定居民族之间不断争斗、分裂、碰撞、融合，这使原始的文化贸易交流仅存于局部地区或某些地区之间。不过，随着各定居民族强国的不断反击和扩张，这些国家之间就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如西亚地区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安息王朝与罗马在中亚和地中海沿岸的扩张，大夏国对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以及促使张骞动身西域的大月氏西迁。这些都说明上述地区之间进行大规模交通的要素已经具备，出入中国的河西走廊和连通各国的陆路交通业已被游牧民族所熟知。

丝路商贸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大大激发了中原人的消费欲望，因为商贸往来首先带给人们的是物质（包括钱财等）上的富足，其次是来自不同地域的商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紫驼载锦凉州西，换得黄金铸马蹄”，丝路商贸活动可谓奇货可点，令人眼花缭乱，从外奴、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而外来工艺、宗教、风俗等随商进入更是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成了中原高门大户的消费对象与消费时尚。相对而言，唐代的财力物力要比其他一些朝代强得多，因此他们本身就有足够的能力去追求超级消费，而丝路商贸活动的发达无非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而已。理所当然的就有许许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异，有钱人不仅购置珍奇异宝而且还尽可能在家里蓄养宠物、奴伎。诚如美国学者谢弗所言：七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崇尚

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从而大大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丰富了各国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更是繁荣昌盛。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由于生活的环境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如印度文化系统、中亚诸族系统、波斯—阿拉伯文化系统、环地中海文化系统、西域民族文化系统、河西走廊文化系统、黄河民族文化系统、青藏高原文化系统等等。而在这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无疑是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

季羨林先生曾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这两个地方汇聚了四大文化的精华，自古以来，不仅是多民族地区，也是多宗教的地区，在丝绸之路沿线流行过的宗教，如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甚至还有印度教，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文化，都曾在这里交汇、融合，进而促成了当地文化的高度发展。尤其是摩尼教，以其与商人的特殊关系，始终沿丝绸之路沿线传播。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摩尼教自13世纪始即已彻底消亡，而最近在福建霞浦等地发现了大批摩尼教文献与文物，证明摩尼教以改变了的形式，在福建、浙江一带留存至今。对霞浦摩尼教文献的研究与刊布，将是本丛书的重点议题之一。

季先生之所以要使用“最好的”和“最有条件”这两个具有限定性意义的词语，其实是别有一番深意的，因为除了敦煌和新疆外，不同文明的交汇点还有许多，如张掖、武威、西安、洛阳乃至东南沿海地带的泉州，莫不如此。新疆以西，这样的交汇点就更多，如中亚之讹答刺、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怛罗斯、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花刺子模，巴基斯坦之犍陀罗地区，阿富汗之大夏（巴克特里亚）、喀布尔，伊朗之巴姆、亚兹德，土耳其之以弗所、伊斯坦布尔等，亦都概莫能外，其中尤以长安、撒马尔罕

和伊斯坦布尔最具有典型意义。

西安古称长安,有着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流的坩埚,世所瞩目的长安文明就是由各种地域文化、流派文化融汇而成的,其来源是多元的,在本体上又是一元的,这种融汇百家而成的文化进一步支撑和推动了中央集权制度。在吸收整合大量外域文化之后,长安文明又向周边广大地域辐射,带动了全国的文明进程,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推向高峰,并进一步影响周围的民族和国家;同时中国的商品如丝绸、瓷器、纸张大量输出,长安文明的许多方面如冶铁、穿井、造纸、丝织等技术都传到域外,为域外广大地区所接受,对丝绸之路沿线各地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体现出长安文化的扩散性和长安文明的辐射性。这是东西方文化长期交流、沟通的结果。在兼容并蓄思想的推动下,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不断进取,由此谱写了一部辉煌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长安文化中数量浩繁的遗存遗物、宗教遗迹和文献记载,是印证东西方文化交流、往来的重要内容。

撒马尔罕可谓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其地连接着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帝国。关于该城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其为康国的都城,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从这里出发,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这里汇聚了世界上的多种文明,摩尼教、拜火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里都有传播。位于撒马尔罕市中心的“列吉斯坦”神学院存在于15—17世纪,由三座神学院组成,他们虽建于不同时代,但风格相谐,结构合理,堪称中世纪建筑的杰作。撒马尔罕的东北郊坐落着举世闻名的兀鲁伯天文台,建造于1428—1429年,系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乌兹别克斯坦著名天文学家、学者、诗人、哲学家兀鲁伯所制,是中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天文台之一。兀鲁伯在此测出一年时间的长短,与现代科学计算的结果相差极微;他对星辰位置的测定,堪称继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巴尔赫之后最准确的测定。撒马尔罕北边的卡塞西亚,原本为何国的都城,都城附近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面是突厥、婆罗门君王,西面供奉波斯、拂菻(拜占庭)等国帝王,这些都受到国王的崇拜。文化之多样性显而易见。

伊斯坦布尔为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和港口，其前身为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地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是世界上唯一地跨两个大洲的大都市，海峡以北为欧洲部分（色雷斯），以南为亚洲部分（安纳托利亚），为欧亚交通之要冲。伊斯坦布尔自公元前 658 年开始建城，至今已有 2600 年的历史，其间，伊斯坦布尔曾经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拉丁帝国、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位处亚洲、欧洲两大洲的结合部，是丝绸之路亚洲部分的终点和欧洲部分的起点，其历史进程始终与欧亚大陆之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见证了两大洲许许多多的历史大事。来自东方的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这里彼此融合、繁荣共处，使这里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地区。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多元、民族和谐主要得益于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民族政策的宽松——无论是中原王朝控制时期，还是地方政权当政期间，都不轻易干涉居民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上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相互切磋砥砺，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中，包含着各民族对各种外来思想观念的改造和调适。“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通过多手段、多途径的传播与交流，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构成一道独具魅力、异彩纷呈的历史奇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可称得上是一条东西方异质经济的交流之路和多元文化传播之路，同时又是不同宗教的碰撞与交融之路。

为了进一步推进“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价值的研究，本人在甘肃文化出版社的支持与通力合作下策划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得到全国各地及港澳台学者的支持与响应。幸运的事，该丛书一经申报，便被批准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为一套综合性学术研究丛书，从不同方面探讨丝绸之路的兴衰演进及沿线地区历史、宗教、语言、艺术等文化遗存。和以往的有关丝绸之路文化方面的论著相比，本套丛书有自身个性，即特别注重于西北少数民族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在充分掌握大量的最新、最前沿

的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内容的选取和研究成果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前沿性。整套丛书也力求创新，注重学科的多样性和延续性。

今天呈现于诸位面前的这5册图书只是该丛书的第一批成果，今后会连续出版第二、第三批乃至更多，竭诚欢迎各位同仁的参与、批评与指导。

杨富学

2016年8月23日于敦煌莫高窟

西夏文物考古的一面旗帜

牛达生先生《西夏考古论稿》(二)序

史金波

我历来很敬重考古学家,因为他们经常在田野工作,栉风沐雨,多了几分辛苦;他们的考古收获往往提供给其他学者使用,慷慨大方,多了几分奉献。牛达生先生是考古科班出身,一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既长期做考察、发掘,又强于研究、探索,特别对西夏文物考古事业贡献良多,现虽至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令人敬佩。

西夏学的产生与发展和考古密不可分,可以说西夏学发轫于考古,没有新文物、文献的发现就没有西夏学的今天。近代文物考古工作的进展,使西夏文物、文献重见天日,使西夏研究迅速发展,别开生面。考古工作中文物遗址调查、考古发掘、文物搜集、文物修复、文物保护、文物记录、文物研究等基础性的工作为西夏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新材料。19世纪初,西北史地学家张澍在武威打开了砌封多年的西夏《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从而拉开了获取西夏研究新资料的序幕。一个世纪之后,黑水城遗址文献和文物的发现,轰动了学界。20世纪70年代以后,宁夏、甘肃、内蒙等地的考古作逐步发展起来。宁夏西夏陵园的勘察、发掘,大量重要文物的发现和保护,宏佛塔、双塔、一百零八塔的维修和文物的发现,灵武西夏瓷窑的发掘和大量瓷器的发现,山嘴沟西夏石窟及文物的考察,闽宁村西夏墓地的发掘;甘肃省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的考察,

武威小西沟岷、亥母洞文物、文献的发现,武威西夏墓的发掘,内蒙古黑水城遗址、绿城遗址、高油房遗址的考察和文物的发现等重要考古活动,对西夏学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决定性作用,使传统史料匮乏的西夏研究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大幅度进展、延伸。目前西夏学领域涉及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法律、文学、宗教、印刷术、医学、建筑等诸多方面,研究视野日益广阔,研究品质逐步提高。

我虽非考古专业,但大半生也与考古专家们结下不解之缘。由于从年轻时即投身西夏研究之故,早就接触西夏考古和众多考古专家。我1962年考为西夏文研究生后,1964年即随导师王静如先生到敦煌,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合作考察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洞窟,接触到以常书鸿先生为首的一批艺术家和考古学家。当时还特别聘请看北京大学考古专家、正值壮年的宿白先生为顾问。当今著名敦煌学家、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当时还是入所不久的青年专家。“文革”期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学部”人员被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后又移师河南明港专搞运动。明港一带有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有时在农田地表都能捡拾到石斧、石箭簇等文物。在运动不太紧张之时,考古所的专家们专业兴致大发,手痒难耐,手持铁锹探方寻宝,其中便有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我和本所刘凤翥都热爱考古,便尾随他们参与其中,学得不少知识。后为军宣队发现,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而取缔之。从“干校”返京后,我因较早开始恢复业务,1974年在当时的《考古》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西夏研究论文。1976年“文革”尚未结束,我和同事白滨到西北西夏故地几省区考察西夏文物、文献,拜访了宁夏、甘肃、内蒙古的不少考古学家。当时牛达生先生早已在宁夏博物馆工作。后来我和牛先生有着过从甚密的交往,他给我的印象是工作踏实,为人忠厚,善于思考,不事张扬。

牛达生先生是西夏考古工作中的佼佼者,学术领域宽泛,学术视野广阔。他致力于西夏考古研究已达半个多世纪,是新中国西夏学蓬勃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西夏遗址调查、考古发掘、文物研究方面成绩斐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参加了西夏帝陵、贺兰山拜寺口双塔、拜寺口方塔等项重大考古发掘

工作。考古学中的田野调查与现场发掘工作需要脚踏实地、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牛先生有着扎实的考古专业基础,更有强烈的责任感,在田野工作中,一丝不苟,尊重事实,积累资料,逐步展开各项研究。凭借深厚的专业知识与历史学、社会学背景知识,他在文物考古工作中得心应手,不断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西夏钱币、西夏印刷、西夏造纸业、西夏建筑、西夏雕塑艺术等方面屡有新见,不时引领西夏考古研究的方向。

牛先生既是西夏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参与者,也是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尽管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传统乃至学术共识,但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出现专业化和整体化并行的趋势,各学科间的交融性、交叉性加强。西夏研究也是如此,如文献研究中包含着版本学、文字学,也包含着印刷史以及其他多方面的研究信息。牛先生将文物考古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探究西夏历史的真实面目,持续关注西夏的宫殿、陵墓、寺塔、石窟、城寨、碑刻、印章牌符、钱币、泥塑石雕、唐卡、木版画、纺织品、服饰、陶瓷器、金银器、竹木器等西夏考古重点领域,坚忍不拔地不断探索和积累,发表了大量论著。从其著述可以看到他学问扎实,考证详实,立论有据,脉络清晰。他踏实认真的研究作风和严谨规范的学术风格已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牛先生在活字印刷术的研究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他经过认真研究首先提出宁夏方塔所出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木活字本佛经,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版印本实物。1996年11月6日在中国印刷博物馆召开西夏木活字成果鉴定会,由国家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科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印刷技术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我作为鉴定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从西夏文本的角度充分肯定、支持牛先生的论点。会上大家都确认牛先生的研究成果,认为他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印刷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由于牛先生在西夏木活字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1997年在中国新闻出版署举行的“第五届‘毕昇奖’授奖大会”上,牛先生荣获“毕昇奖”。

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造就了先生识别与鉴赏文物的卓越水平。近年来,随

着文物收藏热,假文物悄然混迹市场,并且造假的技术越来越高。甚至有的专业出版社也将文物赝品公开出版。文物识别需要各方面的知识,对文物的器形、款识、质地、刻工、纹饰、铭文、包浆、轻重、工艺制作特色以及敲击声音等方面都要细心地观察,深入地研究,若非多年经验积类,难以胜任。文物的识别有时还掺杂人际、利益关系,有的人就马马虎虎,含糊其辞,甚至颠倒是非,指鹿为马。牛先生有着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凭借良好的专业知识,对西夏文物的定性和识别辨伪实事求是,做出了许多贡献,尤其是在西夏钱币方面,指出一些不实之说,还历史文物以本来面目,得到学界的认可和嘉许。牛先生性格耿介,对学术不良作风敢于抵制,甚至当面斥责,给人留下刚直方正良好印象。

201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和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王静如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牛达生先生以八十高龄出席了这次学术盛会。会议为祝贺先生八十寿诞,表彰其在西夏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在集体晚餐时,特别为先生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为使先生惊喜,事先并未告诉先生。当生日蛋糕呈现在先生面前,大家不约而同地为先生唱起“生日歌”,先生异常激动,目光闪闪,颤着声连连道谢,让大家看到一个学者可爱可敬的单纯秉性。

牛先生虽已过杖朝之年,却宝刀不老,勇挑重担。2014年春带领中青年专家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的重点子课题《西夏陵出土残碑整理和研究》,计划将出土的夏、汉文字残碑全部整理、译释和研究,并对寿陵残碑做复原研究,显示出牛先生旺盛的学术青春。

2014年牛先生喜事连连。牛先生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突出的学术贡献,获得了宁夏第二届社科突出贡献奖,可谓当之无愧,名至实归。牛先生至今仍努力工作,为他钟情的西夏学和文物考古事业继续奋斗着。

此次出版的《西夏考古论稿》(二)是牛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又一次的汇集,仍然是以西夏考古、研究为主,涉及西夏考古和西夏历史文化研究的诸多方面,这部《论稿》是西夏学研究中的优秀成果,既有专题的研究,也有综合性的阐述,倾注着先生辛勤的劳动,也展示出先生的学术品格,记录着对西夏社

会历史文化认识的过程,反映出西夏考古在西夏研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学习、欣赏先生研究成果的同时,衷心地祝福先生身体健康长寿,事业再添锦绣。

史金波

于北京市朝阳区南十里居寓所

2014年12月26日

目 录

综 论

西夏学研究与宁夏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地位 / (003)

传统史学对西夏的研究以及黑城西夏考古对西夏学产生的重要作用 / (014)

西夏考古发现与研究简述 / (024)

黑城西夏文书的发现与研究 / (031)

贺兰山概况及其在西夏以前的情况 / (052)

专题研究

独具一格的西夏文学 / (063)

简述西夏舞蹈、戏曲和杂技 / (076)

西夏文字及文物中所见其使用情况 / (081)

浅论佛教不是西夏“国教” / (094)

从考古发现看红寺堡历史的新线索 / (103)

石窟、寺塔与陵寝研究

西夏石窟艺术浅述 / (119)

宁夏境内的西夏古塔建筑 / (147)

西夏陵考察测绘工作概述 / (160)

漫议西夏帝陵建筑特点 / (166)

官印、擦擦与碑刻研究

西夏官印、符牌浅述 / (179)

汉地小泥佛、小泥塔名称考

——兼论“擦擦”名称 / (189)

元代、明代西夏遗民碑刻浅述 / (196)

印刷术与书籍装帧研究

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概述 / (211)

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及活字印刷技术研究 / (231)

浅议王祯《印书法》“界行”与明清活字“行格界线” / (251)

《观经》残页是佛祖版画残片 / (264)

金皇统千佛铜牌是“金属活字版”质疑 / (273)

元刊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发现、研究及版本价值 / (280)

元刊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七十六卷考察记 / (291)

西夏文佛经出土于灵武火神庙夹墙中 / (298)

试论中韩金属活字印刷术起源之争 / (302)

关于西夏活字印刷研究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

——兼谈媒体对学术研究成果的曲解报道 / (313)

西夏木活字印本《本续》鉴定的前前后后 / (323)

钱币与货币经济研究

先贤对西夏钱币研究的贡献 / (335)

西夏文字与西夏文钱币 / (348)

我对西夏文折二“大安宝钱”的再认识 / (356)

钱谱西夏文钱币两谈 / (360)

一座重要的西夏钱币窖藏

——内蒙古乌审旗陶利窖藏 / (366)

从宁夏盐池县萌城窖藏钱币谈高丽“三韩通宝” / (373)

西夏“𧰾都”年号假钱两种 / (377)

四体“至元通宝”考述

——兼论该钱为清末戏作之品 / (382)

对钱产生根源之我见 / (394)

再议对钱——兼述西夏对钱 / (403)

珍惜出土资料 写出好的文章 / (412)

我的西夏钱币研究 / (415)

其 他

《郎君行记》与契丹字研究

——兼谈不能再视《郎君行记》为女真字了 / (423)

《“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读后 / (431)

附 录

张树栋：印刷史上的突破性进展

——牛达生《西夏活字印刷研究》读后感 / (439)

庄申一：何需高扬鞭？“老牛”自奋蹄

——记“毕昇奖”获得者、著名西夏学专家牛达生 / (442)

孙继民、宋坤：《西夏考古论稿》读后感及补论 / (455)

于光建：西夏文物考古研究的典范之作

——读牛达生先生《西夏考古论稿》有感 / (467)

杨富学、曹源：植根西夏，惠施泉界

——评牛达生新著《西夏钱币研究》 / (472)

后 记 / (479)